

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
文 件

(1871年9月17-23日)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社

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文件

(1871年9月17—23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ISBN 7-300-02849-7/D·352

I . 第…

II . 国…

III . 伦敦代表大会(1871)-会议资料

IV . D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001 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 157 号 邮编 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插页 4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3 000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宗禹 张佩航 张汉清 殷叙彝 谢 钊

主 编：顾锦屏

副主编：王学东 李长征 洪肇龙 顾家庆

编 委：杨光远 宋洪训 陈 丹 林勋建 林 海

张中云 胡文建 胡振良 高 放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参加本卷翻译工作的有：钟韵娟 顾家庆 张文焕 胡文建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陈 丹（责任编辑）

祝东平（封面设计）

徐力坚（版式设计）

出版说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是 1984 年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倡议编辑的。当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筹组了编辑委员会。编委会商定：这套《文献》主要收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发表的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某些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收编材料力求齐全；凡国外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根据国外版本翻译；文件散见于国外不同出版物者，由我们统一编译；文件按原件翻译，不作修改删节，以便读者了解这几个国际组织的历史本来面目。在编委会、广大编译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这套《文献》于 1986 年开始陆续面世。截至 1997 年，共出版了 22 卷，约完成预定出版计划的三分之一。这期间，曾代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为这套《文献》的编译出版提供了资助。

这套《文献》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

的第一手资料，博得国内外学者好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译出版工作遇到了困难。首先是编委会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主编林基洲，副主编王颖、校纪英相继谢世，有的成员因年事已高、健康欠佳而不能继续工作。其次是出版经费严重不足。这种情况致使这项工作在近几年几乎陷于停顿。鉴于这批资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对于研究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为继续出版这套《文献》多方努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这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同意提供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同意继续做好这套《文献》的出版工作。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对原来的编委会作了调整，成立了新的编委会。新编委会将齐心协力，继续做好《文献》的编辑工作，争取尽早完成原定的出版计划。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1998年6月

译者说明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文件》由弗·阿多拉茨基（曾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主编、联共（布）中央出版社1936年出版。本书是钟韵娟根据这个俄文版译出的，整个会议记录由顾家庆对照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第22卷的附录（法文）作了校订（其中伦敦代表会议记录在校订过程中部分地参考了冯文光和李其庆同志按法文翻译的稿子），对俄文版略有增补和改动，增改的地方用星花（*）标出；其他部分的译文由张文焕同志和胡文建同志根据俄文版校订。书中凡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有出入的引文，都加了脚注。书中索引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984年3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 献

GUOJI GONGCHANZHUYI
YUNDONGSHI WENXIAN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序 言 1

代 表 会 议 记 录

第一次会议	27
第二次会议	36
第三次会议	48
第四次会议	60
第五次会议	66
第六次会议	77
第七次会议	88
第七次会议（续前）	94
第八次会议	105
第九次会议	121

代 表 会 议 的 材 料

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决定	141
代表会议各委员会的材料	142
提交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和材料	151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77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1871 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笔记、草稿和材料

应由代表会议审查的总委员会的建议	181
[恩格斯在代表会议的一些会议上的笔记]	182
恩格斯 9 月 21 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188
[马克思的某些注解]	189
[恩格斯的某些注解]	190
马克思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庆祝第一国际成立 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2

附录

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摘录	195
总委员会关于同盟问题的通信摘录	22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摘录	237

注释

注释	241
----	-----

索引

人名索引	255
期刊索引	302

序　　言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开得非常好，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尖锐和具体地指出：（1）工人阶级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专政；（2）这个党不对宗派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把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是，要使这门无产阶级科学掌握群众，从而变成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就需要工人阶级从分散性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党性。第一国际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袖是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

从协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就把它向这方面引导。马克思在致波尔特的信中写道：“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在60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译者注

代中期，马克思高举国际的旗帜，把加入国际的条件压低到最起码的限度。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①。由此可见，问题在于要在国际的内部使战斗的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把他们引到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来。

国际每年的发展都带来这方面的新的成就。1864 年至 1871 年这段时期，欧洲处在“风暴和革命时期”。口号和人们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受到考验。工人群众越来越看清了社会主义中一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非无产阶级性质。国际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越来越明确地使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话的情况与年俱增。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的国际党组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逐年增加。

在 70 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坚决地强调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用和意义的问题。

早在 1870 年 6—7 月，也就是在普法战争和公社以前，马克思就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普法战争妨碍了代表大会的召开；但是，这场导致帝国垮台的战争，法国的新的革命的临近，为无产阶级在统一的德国内进行革命斗争创造新环境的俾斯麦的暴风雨般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飞速进程，——所有

① 由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 1869 年 3 月 9 日通告（见本卷第 243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中文 1 版，39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译者注

这一切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充沛的精力重新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问题。恩格斯在 1871 年 3 月致德国工人的信中写道：“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关心使七年前开始的整个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联合不致破裂。而这是最主要的。”^①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加强它同国际的联系。至于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建议“利用共和国必然给予的自由组织政党……，在建立组织之后，一有可能立即采取行动”^②。这样的指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杜邦）在推翻帝国之后马上向法国的国际活动家们发出的。未必需要证明，如果在 1870 年建立一个以巴黎工人为首的团结一致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公社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马克思天才地揭示了公社社员不朽功绩的真正意义，指出公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新阶段的起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聚集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训练以迎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斗，而这个训练的决定性因素是建立一个能够在新的环境中教育无产阶级迎接它的未来斗争的政党。

恩格斯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说：“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192 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60 页。——译者注

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①在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中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其他发言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一个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斗争内容。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1 年即新时代一开始，向第一国际提出的那些直接任务的历史背景。

二

公社引起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组织的切齿痛恨。欧洲警察的所有力量都行动起来了。公社被残酷地镇压了，资产阶级犹嫌不够，它们的报纸疯狂叫嚣，诬蔑公社的英雄，捏造关于国际及其领袖——马克思的各种各样的谣言。许多国家的政府禁止国际支部在本国的存在，并且彼此正式商谈用共同的力量在整个欧洲消灭国际。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召开应届公开的代表大会。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这一年的 9 月在伦敦召开“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

国际的内部斗争从巴塞尔代表大会以来非常尖锐化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449~4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译者注

对公社的态度是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试金石。由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积极地在全世界宣传公社的事业。马克思在1871年4月写道：到处“都向工人们说明了这个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实性质”^①。

巴黎工人的庄严的斗争使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欢欣鼓舞。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光荣地经受住了考验，并公开地声明拥护公社。

公社给了法国工人运动中蒲鲁东主义残余以毁灭性的打击。公社也推动了部分布朗基主义者靠近国际。关于领导公社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恩格斯写道：“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公社……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②。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国际的许多不可靠的同路人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在法国，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公开转到凡尔赛人的营垒中去。在英国，部分工联主义者被国际对公社的态度引起的资产阶级愤怒风暴所吓坏，可耻地宣布同国际脱离关系；其中有投降主义者、总委员会的老委员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他们于1871年6月被开除出总委员会。

但是，在国际的困难时刻，它的队伍里的“左的”反对派——巴枯宁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效劳，要比所有的托伦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8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25、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译者注

奥哲尔加在一起都多得多。

巴枯宁及其喽罗在革命斗争的基本问题上同马克思有深刻的意见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①。

斯大林 30 年前写的这些话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宗派主义的真正根源，揭露了他们在广阔的无产阶级舞台上放弃斗争、害怕群众、冒险主义、空谈消灭一切权威和任何权威（同时保留首领们“看不见的”独裁集团）的真正根源。巴枯宁及其同伙用自己伪革命的夸张言词来掩盖他们理论的最反动的目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和历史必然的杠杆；**放弃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就是给资产阶级以行动自由；**放弃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在阶级敌人面前解除工人的武装。

以巴枯宁和吉约姆为首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原则上放弃任何政治，实际上它当然是从事政治的。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说：“争论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中文 1 版，2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译者注

只要把普法战争和公社时期的两条政治路线加以对比，对这个“争论”的实质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总委员会的政策即马克思的政策的主要标志是：（1）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是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典范；（2）马克思的口号（在巴黎起义以前）是：首先建立政党，后实行发动；（3）从起义爆发时起，奋不顾身地为公社斗争，竭尽全力无条件地支援公社，向公社指出怎样改正所犯的错误以及怎样避免新的错误；（4）公社覆灭以后，发表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名宣言，在宣言中国际向全世界宣布，公社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杀害它的刽子手们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巴枯宁主义者用什么同马克思的政策相对抗呢？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路线”是：（1）沙文主义地叫嚣维护法国的“正义事业”，加上公开地仇恨日耳曼主义；吉约姆在瑞士滑稽可笑地号召招募同普鲁士人斗争的志愿军；（2）远在工人群众在巴黎发动以前就制定了在法国“立即”举行起义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即不作任何准备，按照“自下而上和从地方到中央”^①的原则进行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和野蛮的”^②起义；（3）巴枯宁亲自参加的可悲的里昂冒险行动，他在市政厅庄严地宣布“废除”国家之后，“国家以两连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形式走进了门口忘记派警卫站岗的市政厅，肃清了大厅，使得巴枯宁不得不匆忙溜到日内瓦去”^③；（4）

① 1870年3月12日巴枯宁致利沙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编者注

② 《巴枯宁全集》，第2卷，200、215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译者注